

模仿与独立

——谈中村正直·夏目漱石的留学思想

吴桐

提要 模仿与独立,是东方民族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走向近代化这一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百年前的日本知识分子,中村正直以模仿为己任。留学英国后,积极倡导西方的文明观。隔三十多年后的夏目漱石则以独立为原则,把自己留学英国的感受与国家、民族相连接,提倡“自己本位”、“日本本位”、“内发性的文明开化”。两位思想家的观念,反映了日本近代化过程的重要时期——明治时期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 模仿 敬天爱人 独立 自己本位 日本本位 内发性 文明开化

传统的日本文化,受外来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影响甚大。但是,纵观日本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作为一个民族。尽管它无法避免西学东渐以来的无数次文化冲击,却始终保留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即在于不断地寻找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相融点,不断地将外来文化加以消化,而创造出适合于自己国情的多重性文化。

明治时期(1867—1912)是日本历史上最为激烈动荡的一个时期。文化领域中的一个最大课题是如何去调处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与同处于东方的中国一样,日本受到了西方文明,首先是武力的强大冲击。但是,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提倡并推行文明开化(即西洋化)使日本避免了为西方列强殖民瓜分的悲剧,使日本一跃而为东方发达的“一等国”。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莫不无限感慨。

这一时期的外来文化传播者之中,最为出色是一批曾经远渡重洋,留学西方的日本文化人。他们深刻地去体会与理解西方制度,研究其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不断地学习西方文化的精髓,努力地吸收其内在的精神,力图使日本早日实现近代化。但是,正如文化界引发的“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等大论争一样,对于外来文化吸收的“度”难以把握。小论提出“度”这一问题,将素有“被遗忘的思想家”之称的中村正直(1832—1891)与明治末期也赴英留学的著名作家夏目漱石(1867—1916)的留洋认识加以比较,对日本追求完全的“西洋化”或“全盘西化”至追求具有独立精神的“内发性”的文明开化这一过程加以考察比较,进而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原动力进行初步探讨。

收稿日期:1995-09-26

• 76 •

一、中村正直的赴英考察

1866年，没落的德川幕府政权解除了出国的禁令，派遣十二名有“秀才”之称的士族子弟赴英国留学。三十五岁的中村正直作为监督人员同行。当时，遭到西方武力沉重打击的日本人并不十分了解西方，而书生气十足的中村正直也正期待着接触一个新奇的世界。

在《中村敬宇先生自叙千字文》中他曾写道：“庆应二年，横跨大洋，遂抵龙动，术艺之场，伴侣秀迈，麒麟凤凰，蒹葭倚玉”。“龙动”是指英国首都伦敦。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家，工业革命在英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城市现出同一片繁荣景象。中村正直所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日本的崭新的世界，是与饥谨，动乱截然相反的工业，艺术发达的西方强国，他深深地为它所吸引。

刚刚抵达伦敦的中村一行，即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在日记中他写道：“如致天文地理兵制等学术，唯有言语自由之英文及语言相辅方能相成，否则诸种学问难进行，故英语学习为第一要务”。所以，他们聘请英语教师，努力学习，每天过着“朝课暮译，轻短角长，锥股悬梁，何暇忆乡”的废寝忘食的日子。

中村正直原来在幕府设置的官家学堂昌平坂学问所（东京大学前身）的时候即有汉学家之名，人们尊称为“敬宇先生”。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这在把中国视为文明之母国的日本汉学家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震惊之余，他们对日本将来的命运不觉充满了忧虑。中村正直在《留学奉愿候存寄书付》中，他曾提及林则徐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也许是受其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鼓舞，中村正直“忧虑隐蔽”，“忽思壮游”而踏上留学之路。

在留学的前一年，中村正直有心地向友人胜海舟借来《英汉辞典》加以抄录，对英国有了初步的认识。而这次留学，丰富了他的阅历。在与英国人的直接接触中，他认识到英国正是他所期待的理想之国，未来的日本也必须如此。

二、中村正直的英国观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封建制度的堡垒垮台了，中村正直一行不得不中止留学。但他从英国回来之前，从英国朋友那儿拿到了Samuel Smiles (1812—1904)所著的《self—help (自助论)》一书。他认为这是一本“西国古今俊杰之传记”，因为书中收集了众多西方名人的生活小插曲，可以以此作为典范来示喻国人。这部作品的中心议题“天助自助者”，“有志者事竟成”，1851年其书在欧洲刚出版的时候，立刻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归国船上，中村正直手不释卷地阅读这本书，回国之后，立刻投入了翻译工作。1872年这本书终以《西国立志编》一名问世。作为介绍西方的最新书籍，它深受明治开国时期追求立身出世，显亲扬名的日本年青人的喜爱。据说当时的发行量总计达到一百万部。对于它的社会价值，日本民本主义思想家吉野作造博士曾评价说：“与影响感化之甚大（福泽喻吉）翁之著作可并称为空前之作。如果说福泽为明治青年打开了智的世界，那么可以说正是敬宇为他们打开了德的世界。”

中村正直所发现的西方世界，与东方古代以来一直持有的夷狄观迥然不同。他赞美讴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并探究西方伦理中“德”的存在。他认为：

(1) 西方开化国家，大致将学问二分为精灵之学（形而上学）和物质之学（形而下学）。这与东方盛行的一味重视考据的学问不同。西方是重视实验和分析的实证主义思想，从而产生了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又为社会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2) 物质文明的发达，并不是意味着轻视或忽视伦理道德。与东方的忠、孝为主的个人道德规范一样，西方也提倡忍

耐、勤勉、节俭等观念，正如“天助自助者”一语所示，“人民有独立自主之志行，故有自主之权，故国家有自主之权”（《西国立志编》）。(3) 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与日本的幕藩体制不同，英国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虽然鸦片战争使维多利亚女王在东方名声雀起，但是中村正直一见之下，不过是一“寻常老太婆”。如今的英国迎来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中村正直认为这不是明君圣主的功劳，而是几百年议会民主政治作用的结果。(4) 英国人信奉基督教，相当于东方的“天道”。对英国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教化日明，而人心向善”。这一国家的人“有自主自立之志，有艰难辛苦之行”的个人道德，“原于敬天爱人之诚意，以能立济世利民之大业”（《西洋品行论》）。这样，中村正直把西方工业文明的原动力归纳为“敬天爱人”的思想。他超越了一般人所看到的西方船坚炮利，而认识到了社会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

“夫西国之强，由于人民笃信天道，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由于政宽法公”。诚如中村正直所言，西方国家正是于此超越东方，并将东方远远地抛在其后。

三、夏目漱石的英国留学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西洋化的道路，在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众多领域。日本都以西方为模式来进行模仿。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公布，标志着明治近代国家的形成。随之，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日本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东方的“一等国”。

如果说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致力于日本的西洋化，那么到明治后期，日本所面对的问题则是如何进行日本化，即文化领域中的日本回归，夏目漱石就是这一潮流的中心人物之一。

1900年，明治政府新设高中教员外国留学制度。夏目漱石于同年六月，接到“留学两年研究英语”的命令。同年九月，从横浜出发，次月抵达伦敦。就这样，夏目漱石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英国留学生活。

夏目漱石首先体验到的是城市恶劣的环境。最初看到繁华的伦敦，他不禁感慨它确是“世界之大都会”，但是看到繁华之后的恶劣环境之后，又令他相当不愉快。1901年1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伦敦的街道有雾的日子一看太阳，赤黑如血。”这也正是工业革命所遗留下来的公害问题。1902年4月17日在给妻子镜的信中，夏目漱石写道：“当地无樱花之物，春日来临不觉令人怅然。且大抵只是无风流可言之事物与人，毫无可称为雅之兴趣。如若文明如斯，则野蛮反而是充满情趣。铁道列车的声音，火车的烟雾，马车的响动，令人觉得脑袋稍有毛病的人只怕一天也住不下去。”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西方世界的文明与东方世界的“野蛮”这一观点，夏目漱石开始产生了怀疑。

与中村正直所讴歌的“繁华”恰恰相反，夏目漱石的眼里留下的是工业革命后遗症的一片混乱景象，英国社会留给夏目漱石的并不是什么好的印象。

对于曾经憧憬的英国充满失望，身在异国他乡的夏目漱石不觉思念起日本。虽是短暂的两年留学生活，但思乡的情感却始终无法消除。他自认：“吾之兴趣是颇为东方式的，俳句式的，不适合于伦敦的基调”。又如，1902年4月17日的书信中，他写道：“回到日本最大的快乐是尝荞麦吃日本米穿日本服在向阳的廊下假寐看看庭园，这是我的愿望。”渴望过一日的日本生活，对于传统意识浓厚的夏目漱石来说，这种情感一览无余。

英国恶劣的环境，令夏目漱石的留学生活增加了诸多不快。不仅如此，独处异国的他，

“语言怎么也不能自如，又没有钱”，生活充满了苦涩。所以，对英国的背离情绪，随着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民族情感的苏醒就更加深了。

夏目漱石作为文学家步入文坛是在其生涯后期。他有非凡的文学才能。据他自身叙述，对于文学的思考方式，是由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获得的。他心中所想象的英国文学，在文学理论方面也必须是与中国文学相同的。正如《文学论》序中他所说的：“英国文学也必须应该如此，若是如此，学习一生也丝毫无悔。”

但是，夏目漱石所感触到的英国文学并非如此。与“诗即志”，“文章兴国”的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截然不同，英国文学仅仅是作为一种挣钱的职业，一种摩登的业余嗜好而存在。虽然他坚信文学是近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但又不禁失望地感到“成为所谓的英国文学者犹如愚夫”。真正的文学绝非英国文学者所玩味的爱好。所以，文学如何发挥其在近代化过程中应有的作用，成了夏目漱石一生矢志不渝奋斗的课题。

在伦敦居住的两年是他感到最为不快的两年，但是，这一异国体验却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自己本位”的觉悟

在1914年的《我的个人主义》演讲中，夏目漱石回顾了英国留学的经历以及他形成“自己本位”的觉悟的过程。“文学究为何物”，深受汉学影响的夏目漱石难以接受西方人的文学观，愈是学习西方文学，愈令夏目漱石加深了独我的民族意识，让他产生了与西方观念相对抗的独特想法。

《我的个人主义》一文中，夏目漱石提到：“我是一个独立的日本人，作为国民的一员，我至少应该具有不做英国人奴婢的意识。”他又说：“我渐渐考虑到自己本位这四字诀，为了得立证它，我开始进入科学的研究以及哲学的思考。将自己本位这一思想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这种觉悟也愈来愈深刻。至这次演讲，那个时候（英国留学）我所悟到的自己本位这一思想依然如故，不，随着日积月累越来越坚定了。”

夏目漱石的“自己本位”逐步展开为“日本本位”。“日本必须认真，日本人必须睁大眼”这种对日本现状和未来深为忧虑的思考，就充分体现在夏目漱石的文学作品中。

夏目漱石1908年发表的小说《三四郎》中，青年三四郎在乘火车赴东京的途中，邻座的男子看到一对欧洲夫妇，不觉两次赞美道，“啊！真美。”对此，三四郎听到了“了不起的理论家”广田先生的话。“这副长相，这么无用，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日本上升为一等国，也是无济于事的。建筑物也好，庭园也好，仪态都不妙，不比我们的长相好多了，不过——你是第一次上东京的话，还不曾见过富士山喽？马上就能看到了，你好好看看吧。它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名胜，没有东西能比它更值得自豪啦。然而，这富士山乃是天然形成的，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非人力所能左右，也不是我们造出来的。”这不禁令三四郎瞠目结舌。对于日本未来的命运，广田先生又用一种轻快的调子说：“将会亡国呢。”令三四郎更加震惊。

这也正是夏目漱石自己的心情流露！推进西方式文明开化的日本，其固有的传统荡然无存了。而西方文明的现状令人痛感“欧洲今日文明之失败”，同时，未来的日本又将走向何处，夏目漱石担心日本会重陷欧洲先进国家的覆辙，忧心忡忡地思考着日本正在进行的文明开化的前途问题。

1911年发表的《现代日本的开化》一文即是夏目漱石一系列思考之后的结晶。他认为：“日本的文明开化，自始至终都是为西方文明冲击之下的外发性的文明开化，日本不得不与西

方交往，交往中又逐渐丧失了自己，这种皮相化的开化从今以后必须转变为内发性的、精神的开化，也就是日本本位的文明开化。”他认为这是现代日本必须直面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这种认识的产生早在他的英国留学时代即已见端倪。1901年3月1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人云日本三十年前即已经觉醒，那也只是为夜半钟声急催而起。这种觉醒却并非真正的觉醒，狼狽不堪。文学、政治、商业皆是如此。日本如果不真的睁开眼不行啊！”也就是说，日本必须重视今日欧洲的现实。认识到单纯地模仿西方是不行的，日本必须走自己的路，独立地走日本自己的路。这与夏目漱石自己在十年后系统阐述的观点完全一致。可见，夏目漱石的文化论思想正是从留学时代开始萌芽，而后逐步走向成熟的。

五、模仿与独立

“模仿与独立”，是1903年夏目漱石在第一高等学校的演讲标题，我借它来比较中村正直，夏目漱石二人的英国观的内在精神，同时以此来概括明治时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大转换。

中村正直的英国之行是在其工业革命完成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之时。当时，日本由于内忧外患被迫开国，随之又一心沉醉于西方“坚船炮利”的形而下学。中村正直被称为秀才，他却为重视实学精神的西方学问所吸引，决心努力学习并吸收运用西方文化。二十世纪之初的夏目漱石的英国之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并转向垄断的帝国主义的时代，此时东方的日本不安心于当西方列强的学徒，它不仅在政治体制、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向西方学习，日本渴望追赶并超过西方，夏目漱石正是在这新世纪伊始的特定环境下，抱着这种使命感而踏上英国之行。

诚如明治初期小说《安愚乐锅》所言，吃牛肉汤即是开化。持有这种意识的日本人，并不十分了解英国，但认定它就是现代文明的代表。而对于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来说，目睹大清帝国失败于西夷之手，眼见美国舰队以利炮迫使日本开国，他们在惊惧之余尝试着将未来日本学问的方向向实学转化。因此，踏上英国国土的中村正直，对于“天文、地理、兵制”等实用学问投入了莫大的关心。但是，他并非局限于关心纯粹的科学技术，他也探究西方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自由意识等文化领域中的更为深刻的问题。

夏目漱石在留学期间，涉猎颇广。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他更为注重文学领域的革新。但是，自小受到汉文学熏陶的他，其文学评论的基础是以中国的老子思想为根基的（谷学谦认为夏目漱石是基于“玄”、“道”思想），并以此来看待英国文学，结果令他万分失望，因为西方文学毕竟与他所理想的截然不同。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接受英国的文学理论。这种矛盾促使他开始跨出文学领域，而从文化的角度上去考察未来的日本。他对于基督教教化东方人深恶痛绝，主张日本人不必紧随西方，应保持东方文化的独特性，但是，生活中的现实常让他处处碰壁，他犹如迷途的羔羊（stop—sheep），所以最终只能是无可奈何的“神经衰弱”，这也正是夏目漱石悲剧之所在。

中村正直英国留学的最大功绩在于翻译和出版《自助论》即《西国立志编》。这本书告诉日本人，西方也提倡忍耐、俭约、勤勉等伦理道德。对此，东京大学的平川佑弘教授高度评价，称其为“明治日本的工业化的国民教科书”。夏目漱石的英国留学，是他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一个日本人”对西方文明的冷静态度和批判精神。可以说，他以后走上文坛，从一名文化人的角度去考虑日本文化的问题，就是基于这一段留学经历。同时，他之所以能成为文坛泰斗，也正是因为他所思考反映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在比较了中村正直与夏目漱石的留学经历,英国观及其思想变化之后,可以认为:中村正直是以“模仿”为其历史使命,是考虑到“日本必须生存”,必须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而出国留学的。而夏目漱石认为未来的日本必须独立,必须进行“内发的文明开化”,因此他首先推崇“个人独立”,再至“日本本位”。诚如明治大思想家福泽谕吉所言的“个人独立而国家独立”这一思想,生活于明治末期的夏目漱石,总结出这一时代主流思想的发展趋势,依据理性的判断,预言日本的将来。这一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以模仿与独立这两条路线来把握日本近代化过程的总体特征,那么中村正直所代表的这一阶段可拟为“模仿”,夏目漱石所代表的这一阶段可拟为“独立”,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标准,来评价明治这一重要历史时代。

中村正直为列强来临之后日本社会产生危机而忧愤,他留学的目的是为了将自己的祖国——东方的日本改造成工业化的近代国家。明治维新、文明开化的蓬勃兴起正是这些日本知识分子的危机感所催化的。而后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成为国际社会强大的一员,可以说这也就意味着中村正直目标的实现。

夏目漱石的作家生涯从1905年至1916年只有短暂的十年,但是,其众多的作品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具有独特的思想性。夏目漱石的作品流淌出作者为祖国深为忧虑的情感:个人怎么办?日本向何处去?经过痛苦的思索,夏目漱石终于摸索到“自己本位”这四字诀,进而他又认为日本的文明开化并非是以自己为本位的文明开化,今后的日本必须是“内发的”精神的文明开化。

从模仿至独立,日本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由浅入深。因此,由此培育出的新文化中,日本固有的因素更为明显。正如历史不停地向前推进一样。夏目漱石的认识已远远超过中村正直,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适合于自己发展的道路,即从“模仿”至“独立”这期间经历了四十年时间,日本通过一个辩证的否定,完成了近代化的过程。

今日之中国,正如百年前的日本,在经济大潮之后,必然面对的是如何振兴民族文化这一问题。百年前的日本的知识分子,中村正直和夏目漱石的经验,或许能给予中国人启迪。

参考文献:

- [1] 三好行雄编 《漱石书简集》 岩波文库 1993年
《漱石文明论集》 岩波文库 1993年
- [2] 平冈敏夫编 《漱石日记》 岩波文库 1993年
- [3] 伊豆利彦 《夏目漱石》 新日本新书 1990年
- [4] 中村正直 《西国立志编》 讲谈社 1992年
- [5] 《漱石》全小说 第三书馆 1992年
- [6] 东秀纪 《漱石的伦敦·哈瓦多的伦敦》 中央公论社 1991年
- [7] 谷学谦 《夏目漱石和老子思想》 见《日本学研究》 1993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语系 责任编辑:张与陈)